

近代中国武术的国家化建构

初晓帅¹, 李吉远²

(1.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基础教学部, 山东 潍坊 261000; 2. 杭州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 晚清以降, 伴随军事技术变革与武举制废除, 传统武术逐渐与国家体制疏离, “义和团运动”更使武术发展由此步入低谷。而短短二十几年后“国术”却作为民族本位意识的新名词而取代“武术”, 成为身体技艺的新标签。民族主义“向内”的文化拉力推动其成为民族精神载体与强国强种工具; 科学主义“向外”的压力促使其经历知识体系的科学化转译与重构; 国家权力“向下”的效力则将作为国民运动的武术, 通过教育体系与行政网络纳入国家体制。这三重力量的交织与共振, 不仅系统推动武术从乡土技艺向“国术”象征的根本转型, 更完整展现了近代中国如何借助武术的政治化与制度化, 将其深刻嵌入民族认同塑造与国家建设的宏大议程之中。

关键词: 武术史; 武术转型; 民族主义; 科学主义; 国家权力

中图分类号: G8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6)04-0050-07

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Wushu

CHU Xiaoshuai¹, LI Jiyuan²

(1. Department of Basic Teaching, Shandong Vocational Animal Science and Veterinary College, Weifang 261000, China; 2.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along with the changes of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the abolition of martial arts, traditional Wushu had been gradually marginalized within the national system, and even the Boxer Rebellion brought the Wushu's development to a low point. Within just two decades, however, "national arts" replaced "Wushu" as a new term imbued with nativist consciousness, and also becomes its new label. The "inward" cultural pull of nationalism reconfigured it as a carrier of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an instrument for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 and its people, and the "outward" pressure of scientism compelled its scientific reinterpretation and systematic reconstruction, and the "downward" force of state power incorporated martial arts, as a national movement, into the state apparatus through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nd administrative networks. The interplay and resonance of these three forces not only drive the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Wushu from a local skill to the symbol of "national arts", but also demonstrates that how modern China, through their politic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deeply embedded them within the grand projects of shaping national identity and building the modern state.

Keywords: Wushu history; Wushu transformation; nationalism; scientism; state power

武术这一称谓对应的身体技艺, 在晚清经历了深刻历史性转变, 伴随西学东渐与火器在军事中的广泛应用, 传统冷兵器在军事中的主导地位逐渐丧失, 新式练兵方式的引入以及武举的废除, 使得传统武术与国家体制间的互动关系日渐疏离。义和团运动借“设坛练拳”为组织形式, 以“降神附体”“刀枪不入”为

号召, 其失败不仅招致清廷对民间武术的进一步压制, 也使其他拳种流派陷入生存困境, 武术发展整体步入低谷。而随着国门洞开, 大量新词汇涌入, “国术”作为具有民族本位意识的新名词, 逐步取代“武术”, 成为这一身体技艺的新标签。据唐豪《中国武艺图籍考》记载, “国术”这一名词始于李烈钧, 根据唐豪的推测,

收稿日期: 2025-12-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VJX016)。

作者简介: 初晓帅(1996-), 男, 助教, 硕士, 研究方向: 民族传统体育。E-mail: 631935930@qq.com 通信作者: 李吉远

李先生曾经住日本,或许见过日本大相扑,民国十六年(1927年)他与许多国府要人发起国术研究馆,大概知道日本的相扑名曰国技,所以把中国的“武艺”改名“国术”^[1]。时论认为:国家的国字从来不能轻用,因为一切事物必须为我国特有而非效仿他人的,方得称之为国,至于术字的解释,系指技术而言,凡是一种技术,必有他独到的长处,对于人类身体精神知识方面有所裨补,才能有存在和流传的价值^[2]。研究从“武术”至“国术”的观念变迁切入,通过综合观念史、身体史与国家建构的理论视角,系统考察自清末至1927年间,武术在民族主义、科学主义与国家权力多重作用下的发展路径。研究不仅关注话语层面的重构,也注重实践层面的体制化过程,力图揭示“国术”概念形成过程中“向内”的文化拉力、“向外”的科学化压力与“向下”的国家权力效力之间的复杂影响,从而对近代中国武术的政治化与现代化转型提供新的阐释。

1 民族主义与文化本位主义的“向内”拉力

1.1 从“文化亡种”到“国粹重塑”:本体性焦虑与价值重估

以“国”字命名中国特有文化的风潮,如民族传统的绘画、音乐、中医、服装等,在文化反思中分别获得了国画、国乐、国医、国服的称号。与此同时,中国固有的民族体育也受到广泛关注。徐一冰^[3]认为,中国武术是中国最古最良的体操术,较之西洋所谓高等体操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方话语体系占据强势地位,致使中国在许多领域陷于“失语”窘境之时,武术的身体语言本身,构成非文字的、反思性的叙事与表达,肩负起为个体乃至民族提供心理慰藉与文化认同重构的深层使命。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家拳种体系及相关理论无不深刻反映着中国古典哲学的思想精髓。当个体演练一招一式时,其所重复的,乃是一套承载着历史积淀、哲学意蕴与审美特质的、属于“中国”的身体动作范式。此套身体语言,构成了一种区别于西方体操、兵操的鲜明文化标识。通过日复一日的身体规训,一种“中国的”身体感得以塑成与强化,个体遂可在与“传统”的身体连接中,获得了某种切实的文化归属感与自尊。张之江^[4]对此高度评价:我国五千年文化历史所以不敝者,国术维护之功,居泰半焉。武术作为“身体化的国粹”,因其深刻承载中国传统的身體观、宇宙观与伦理精神,不仅为个体提供了在身体层面连接传统、确立文化归属的途径,更被系统性地重新发掘为一种抵抗文化自卑、重建民族认同的具身化实践。因此,对武术价值的此番重估,成为其在近代中国文化自觉进程中实现

从技艺到认同载体的关键转折。

1.2 从“病夫”隐喻到“强种”工具:国民身体的再造

1895年严复^[5]在《原强》一文中,较早将中国比作“病夫”,以此警示国家的羸弱亟待变革。此时“病夫”之谓,并非意在贬斥,而是喻指中国如重病在身,亟须寻求救国之道。严复进一步认为,国家强大的基础在于国民素质,中国之积贫积弱,本质上是国民的羸弱。然而,严峻的社会现实无疑加深了这种身体层面的危机感,使得“病夫”的指向最终从抽象的国家落到具体的国民身上。蒋观云^[6]的《中国武士道小序》乃至郭希汾^[7]的《中国体育史》等著述,皆表明身体强弱与民族的生死存亡有其因果关系,并说明身体重塑的迫切与重要性,希望以强健刚毅的身体取代孱弱病态的身体。与主要流通于知识精英阶层的“国学”不同,武术是一种深植于民间社会、可被广泛实践和切身感知的身体活动。时论指出:民气不振,相习成风,年龄尚未就衰,魂魄已游墟墓,操作不力,生产日减,民贫国弱,多坐于此……研究国术,即为强健身体之捷径^[8]。亦有论者进一步强调:惟拳术能使身体各部均齐发育,由臂腕及腰腿之筋力强大,训练至其全身筋肉骨骼系统之发达,便于运用^[9]。因此,欲复兴中华民族,必须首先提倡中华民族体育,借用民族体育之训练,以铸就中华国民之体魄。于是,武术因其在强健体魄方面的独特价值被特别强调,并被赋予“强国强种”时代使命,开始从个人技艺到国家工具的转变。

《北拳汇编》中所附的《拳术歌》:练就铜筋铁骨,保我黄种强^[10]。更是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宣扬武术之于强国强种的现实意义,它直观表达了“习武—强身—强种—强国”的递进逻辑,将个体身体的锻造直接等同于民族力量的积蓄,并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使武术借以“强国强种”这一政治目标在民间获得生动而有力传播。

1.3 从“不武”之讥到“尚武”之国魂:民族精神的具身化

在“强国强种”的宏大叙事中,时人更深远认识到国民之弱实为精神萎靡与刚健风气长期缺失的体现,因而精神的提振与重塑被视为与身体改造同等紧迫。当时舆论认为:凡国之奄奄垂病,濒于死亡者,或见亡于垂头俯首永为人奴而不克自振者,皆因其民缺尚武之风气。进而推导出,唯尚武,始重自由;唯尚武,始求独立;唯尚武,始有爱国心;唯尚武,始有不甘人下之气概^[11]。在这一认知下,中国长期“轻武重文”的文化传统被视为威胁国家兴衰的关键因素。民力的不振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盛行,共同将“尚武精神”塑造为立国之基。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对此疾呼:柔弱之文明,卒不

能抵野蛮之武力。然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也^[12]。此论断不仅揭示尚武精神作为强健个体与凝聚国力的实践基础,更将其确立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核与文明标识。当此种身体政治话语席卷知识界之际,体制内的改革派官僚亦从国家治理角度呼应了这一转向。袁世凯^[13]曾言:国何以强,强于民;民何以强,强于民之身;民之身何以强,强于尚武。此类内部倡导的尚武理念,在与外部经验的相互印证中亦对国人内心产生强烈触动,其中以日本的影响最为深远。甲午战后,曾为中国“学徒”的邻邦日本,转而成为国人学习的主要对象。时论普遍认为,日本对武士道精神的发扬,是其走向强盛的一大动因。1904年梁启超^[14]在《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中慨言: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呜呼,吾耻其言,愤奋其言,吾未能卒服也。日本人指摘的“不武”,既是对中国孱弱国力的蔑视,亦是对其羸弱国民性的嘲讽。在此语境下,习练武术已超越“活动手足,惯勤肢体”的简单层面,实乃被擢升为救国祚之危亡、挽浮靡文弱之风、涵养健全国民所不可或缺的一项具体依托。《中华武士会公启》即以日本之崛起为例,论证了“武道关乎国家兴废”的观点。文中提出中国武术“实甲全球”,亟需提倡,以振我国尚武之风,以立国本^[15]。由此,武术所包含刚健有为、威武不屈之精神,被视为国魂。北京体育研究社在《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案》中认为,在此竞争剧烈的时代,各国莫不有其立国精神,虽然因地理、历史、风俗不同而略有差异,但其中莫不含有尚武精神。而中国虽然因时势所趋而提倡尚武,但其所采之体操皆因袭他人形式,因此成效不彰,主张“今拟提倡中国旧有武术,以振起国民勇往直前之气”[16]。正是出于对“不武”之讥的回应,武术作为一种图腾象征,把整个中国带进自救自存浪潮中。为重振武勇精神,武术的精神培育功能被深入发掘,进而成为培养国民尚武之心的“利器”。习练武术不仅可以增强人体质,更重要的是能培养习练者坚韧和勇敢品质,并以此塑造国人的尚武精神。这种尚武精神,正是中国文化与武术相融合后最具特色的一面,其作为思想影响力,也远远超过了武术本身。

2 科学主义与现代化追求的“向外”压力

2.1 科学权威下的合法性危机:从“国粹”到“迷信”的审判

近代的科学观念在中国经历“由器入道”的演变

过程。如果说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时期,科学主要与技术和制度相关联,那么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赛先生”(科学)则上升为一种普世、不容置疑的价值信仰和衡量一切文化传统的终极标准。自科学观念开始影响中国思想界,至新文化运动时其地位得到了空前强化。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使得传统价值体系彻底解体,以《新青年》为阵地的知识精英对儒家纲常进行了猛烈批判。新文化派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极端否定与批判,不可避免扩展至本土传统体育领域。陈独秀^[17]在呼吁青年从事体育锻炼的同时,亦提出警觉,认为提倡体育应有“三戒”:兵式体操、拳术、比赛的剧烈运动,并指出这些运动“在生理上都违背了平均发达的原则,在心理上都助长了恶思想”。鲁迅亦极力反对打着“国粹”旗号的复古主义,针对北方人教授南方人打拳的现象评论道,国人如此费心推行武术并将其视为所谓“尽善尽美之体育”,倒不如改良下自己,去从事一点实际的劳作^[18]。在思想启蒙的时代主题下,科学不仅是西方先进技术的代表,更成为批判旧价值、旧文化的思想武器。用科学话语衡量一切的价值观念在社会中普遍传播,武术以“国粹”定义自身,自然被视为封建落后的产物而遭到激烈批判。历史的骤变并未给予武术充分的嬗变时间,武术亦被戴上“落后”的帽子,被称为“怪力乱神”的把戏。然而,细致考察新文化运动便可发现,其对传统价值观念的猛烈批判虽是不争的事实,但并未构成全盘否定。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仍怀有深切的归属感。他们的基本立场在于“要吸收西方新的文化而不失故我的认同”^[19]。正如蔡元培^[20]所言: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更先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科学思想的深入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几乎自觉地将科学作为研究国粹的工具,学术研究的科学化也顺势推动了武术研究的科学化。彼时习武者,“一则挟技横行遭社会唾弃,一则知识浅陋,不知其所以然”。西潮的冲击在给中国增添新问题的同时,也提供了解决问题的资源^[21]。“不具有科学性”的武术遭受批判的同时,西方的科学理论、方法也大量传入中国,这使本土武术研究者得以进一步接触西学,从而为武术的“科学化”转型提供历史契机。

2.2 知识体系的科学化转译:传统武术的现代性阐释

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作为一种不容置疑的现代性权威,已然成为衡量一切文化传统存续合法性的终极尺度,然武术中门派畛域之固、理论体系之散,使其难以在科学理性的审视下获得稳固的知识地位。武术精英对此亦有清醒认知:中华拳艺,发明最古,

而今奄奄少生气的原因在于,但精此道者,仍多质而少文,不能阐扬其奥^[22]。这场攸关存续的正当性危机,直接催生“武术科学化”的思潮,迫使传统武术知识启动一场全面的现代性转译——以西方科学话语为蓝本,对传统拳理进行重构与再阐释,以期在全新的知识权力格局中重获承认。武术科学化的首要体现,在于其理论体系经历了深刻去神秘化与系统化改造。传统叙事中充斥的“伪造、神化”等玄学成分被有意剔除,取而代之的是对拳种源流的系统性考证以及对技术体系与训练方法的研究。前人只凭口述而无专书,偶有论说亦无实练入手之法的状况得以改观。《拳艺学初步》《少林拳术秘诀》《太极拳学》《形意拳学》等一批武术教材的相继问世,使武术传承中模糊的经验表述有所改观,为武术技法和理论提供更易于理解的科学阐述角度,推动武术研究从“口传心授”向“文字建构”的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在身体技术层面,研究者尝试运用西方解剖学、生理学与力学原理,对武术动作进行量化分析与系统性解释。许龙厚^[9]在《拳术教练法》中详细阐述武术动作与人体骨骼、肌肉、皮肤、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及神经系统的关联,强调“拳术之动作,合乎生理之构造,能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内脏功能”。此类研究致力于论证武术并非基于经验模仿的“套路”,而是一套符合人体结构与运动规律的“科学训练体系”。与之相应的研究方法论开始转型,学者摒弃门户之见,转而采用实证、比较与历史考证等现代研究方法,对武术展开跨学科探讨。《应用科学之武术》引用西方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原理,分析武术动作主要肌肉功用,指出其“符合人体运动最经济、最协调之原则”^[23]。通过将传统知识转译为科学语言,武术试图逐步摆脱“迷信”“落后”的污名,并开始确立自身学科主体性。此类研究不仅提升了武术学理品格,更在比较视野中为其打通了与现代体育体系的对话可能。系统的科学化转译,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武术的公共形象,使其从深受质疑的“迷信”转而烙上“科学”标签,从而在社会舆论中重获合理性。正如中央国术馆成立时所提到:从前习练国术,只晓得他是一种历代相传的武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自从近数十年来,许多同志们用了科学的方法,生理学、数学、重学的标准来估计我们国术的价值,才晓得我们的国术,不但不是反科学的,而且在科学立场上还有崇高的位置^[24]。虽然当时社会对于武术的科学认识仍存在偏差,但西方研究方式让国人明白了武术丰富的内涵价值。经历此番科学化洗礼,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国术”之“术”,逐渐在现代知识谱系中获取真正的合理性与生命力。

2.3 武术的社会化与体系重构:从民间技艺到现代体育

在科学主义的推动下,武术不仅完成了知识体系的现代化转译,更在实践层面实现了深刻的组织化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武术从一种以技击为核心的民间技艺,逐步演变为具备现代体育特征的社会活动,其存在方式、传承模式与活动机制均发生根本性变化。武术的存在方式转变,最直观地体现为其社会功能的根本性转变。曾经存在于秘密结社、团练、宗族、旧式军队中的武术主要作为一种搏击技艺。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基于社会结构的变迁与体育观念的普及,武术日益被纳入体育与健身的范畴。这一功能定位的转变,使得其从原来的军事技能和个体自卫手段,逐步转变为以“体育的形式存在”。伴随着存在方式的转变,武术的传承模式也经历了系统性的重构,即从私密性的个体传授转向公开化的集体教学。传统武术主要依赖“一对一的师徒制传承”,强调秘传与门户之别,及至20世纪,这一传承机制经历一场深刻重构。随着武术团体的蓬勃兴起,传承的主阵地由个人师门转向社会组织,其核心也从基于关系的个体间传递,转变为基于方法的、可复制的标准化课程传授。马良^[25]创编的“中华新武术”正是这一转变的典型代表。它借鉴西式兵操的操练方法,采取分段分节地配合带数口令的形式,将传统口传心授的武术教学,改造为由基本教练、连贯教练、对手教练和连贯对手教练4部分组成的标准化课程体系。在传承方式革新的基础上,武术进一步通过竞赛规则与评判标准的建立,为建立完善的竞赛体系奠定了制度基础。传统“打擂”因其无规则、高风险而备受诟病,被视为不科学和野蛮的象征。为适应近代运动会的需求,武术开始制定明确的竞赛规则。20世纪20年代初,《中华新武术》首次提出包含姿势、速度、力量等要素的百分制评分法^[26]。随后,1924年第3届全国运动会将武术列为表演项目,首次在全国性赛事中尝试制定了团体与个人的评分规则,形成较为完备的竞赛规程^[27]。至此,武术演练水平的大致评价规则雏形得以确立,其可比性与可操作性显著增强,为武术的竞技化与社会化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武术的社会化与体系重构并非孤立进行,而是与更广泛的社会组织创新相辅相成。精武体育会便是这一过程中的杰出代表。它通过报刊、书籍、电影等各种方式宣传武术,并把西方的训练方法融入武术练习。对于本土之武术,也是兼收并蓄,将流行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各种武术流派融为一体^[28]。这种开放、系统化的组织模式,有力推动了武术从民间技艺向现代体育的转型,为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持续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

3 国家政权建设与社会动员的“向下”效力

3.1 禁而不绝与复苏契机：城乡武术的社会存续与组织化

20世纪初尽管清廷严禁“演弄拳棒教人”与“投师学习”^[29]。但正如马良^[30]所观察：武术教育，在中国已相沿成风，官府虽施强制手段，依然不能制止。各处城垣人民，尚俟厉禁稍弛，始照常练习，至庄乡人民，在严禁之下，亦仍不改其练习武术之习惯。这种植根于社会肌理的深厚传统与坚韧的民间实践，为武术在近代从乡土技艺向国民体育的系统性转型，奠定不可或缺的社会土壤与历史前提。辛亥革命后，民间习武之禁渐开，各地武术团体与组织纷纷复建或新建。拳房、拳社遍布城乡，华北各乡村尤其冀鲁豫一带，各村皆有拳场，每逢农暇夜晚，农民多赴拳场练拳^[31]。与此同时，随着社会阶层变迁与人口流动，使武术的传播范围突破传统地域与阶层界限，延伸至此前未曾触及的社会领域与群体之中。通商口岸及城市经济逐渐发展，大量工人涌入城市，为强身御侮，工余组成习武团体者不在少数，武术活动开始在城市空间拓展。以湖北江岸铁路工人为例，作为近代较早的产业工人群体，他们已有拳棒操习活动。1923年京汉铁路总罢工期间，由擅长武术和身强力壮的工人组成纠察团，对团员和工人群众进行拳脚棍棒格斗训练，平时保卫工会，维持秩序，预防和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32]。更具组织性的武术社团也在城乡武术活动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兴起，武术的组织化与规范化进程也随之展开。至北伐战争前夕，中国各地重要城市已涌现大量武术社团。李存义与天津武术同人在天津组织中华武士会^[33]；成都武术界人士马镇江、马宝等发起四川武士会^[34]……各类武术团体的出现，为拳师提供合法寄身空间，进一步推动了武术的传播。从乡土向城市活动的转变，展现了武术在社会变迁、人口流动进程中成为一项受多数阶层接受的“国民运动”。正如1922年麦可乐^[35]回观50年来中国之武术认为：表面上虽显示盛衰相演之迹，实则揭破秘密，研究公开，进行之速，一日千里。尚武之风，遍于中国，前途发展，正有未艾。

3.2 价值引导与政治整合：武术伦理的国家化再造

传统武术中“侠以武犯禁”的内在逻辑，以及由此可能滋生的“私斗”与“好勇斗狠”风气，与现代民族国家所追求的秩序与稳定构成结构性的冲突。为化解这一矛盾，知识精英发起了一场针对武术伦理的价值再造运动，旨在将其从潜在的“失序”力量改造为“建国”与“强种”的合规性工具。这场价值再造首先着力于切割武术与“暴力”“私斗”的刻板关联，并为其注入符合现代国家需求的公共性伦理。吴稚晖

在演讲中清晰辨析：顾或谓中国之拳术，固为运动之上品，然今有斗勇之性。予谓此非体育之言，不明拳术真价值者之妄语。夫拳术与斗狠，判然为二，曷可相混。有识之人愈习拳而愈温让^[36]。精武体育会的核心成员梁仲璧^[37]进一步阐发，“不以武术为毒群之具，而以武术为育群之基……以强种保种之仁术，普渡一切众生”。此番话语，呈现了武术的精神内核向集体责任与国家义务的趋向，其价值目标被引导至“卫国治产”“养成完全高尚之人格”等旨在塑造现代国民的公德范畴。与此同时，武术的合法性被有意识地与国家意识形态及政治权威深度绑定，形成了密切的互动与支持关系。孙中山关于“火器输入中国后，国人多弃体育直技击而不讲，驯至社会、个人积弱愈甚”^[38]的论述，被反复征引，成为论证提倡国术乃继承“总理遗教”的关键话语资源。国术倡导者据此宣称：吾辈国术同志，责无旁贷，急宜遵照总理提倡国术之遗教，力图健身强种，自卫卫国^[39]。蒋中正^[40]亦亲自为《中央国术馆汇刊》作序，指出“研究国术小可保障身家，大可捍卫种族”，并曾派人延聘拳师担任总司令部警卫团技术教官^[41]。由此，提倡国术超越单纯的体育范畴，在价值引导与政治整合的过程中，武术不仅被赋予了新的文化意义，其自身“简便易行”的实践特性，与契合当时国家资源有限、体育设施匮乏的现实国情，从而被塑造为最具“国情适应性”的活动。王庚^[42]通过系统比较，总结出国术运动的4大优势：经济方面，以徒手为多，无需巨大设备；时间方面，早晚均可练习；场所方面，方丈之地即可从事；适应方面，男女老幼皆宜，仅需略变其练习之度。这种对经济性与实用性的突出强调，使武术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展现出独特的治理价值与推广可行性。由此，“中国武术乃符合国情的体育”不仅成为国术论述的核心观点之一，也为其自上而下的全国制度化推广提供广泛的社会认同与物质条件基础。

3.3 制度建构与组织覆盖：武术行政体系的国家化确立

1878年，正蒙书院在教学中已令诸生分日轮习军事、拳术等项，展现出明确的国粹化取向^[43]。尽管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未将武术正式纳入课程，此类实践反映了武术与国家教育体系接轨的可能。社会精英诉诸学校这一新型教育场域，“借助立法手段，按照体育系统的框图，通过进入课堂，制定教材，分配教学时数，规定学分，争取必修等环节生产武术教育的课程体系”^[44]。1911年，《定军国民主义教育案》建议“高等小学以上，应兼习拳术”^[45]，为武术在学校教育中的合法性提供初步确认。至1915年，第一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军国民教育施行方法案》，明确要求“各

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武术正式被国家教育制度所接纳,成为“国之大事”^[46]。同一时期的精武体育会成员也被上海多所学校聘为武术教师^[47],则从实践层面回应这一制度安排。为将此前初步确立的武术教育制度进一步推向落实与深化,具体化的实施方案与推广路径开始被提上议程。191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4次会议上,山东省教育会提出《推广中华新武术案》,该议案主张系统性地将马良所编《中华新武术》作为标准化教材引入学校体育教学,并获得会议通过。经教育部审定《中华新武术》教科书及相关议案函告各省区教育会,“通知各学校体育教员,以资参考”^[48]。然而,受制于师资短缺、教学内容与教法参差不齐以及政治动荡等结构性困境,全国各地武术教学的实际发展极不平衡,致使诸多法案往往只能停留于纸面,沦为“一纸空文”。这些实践难题导致武术在学校体育中的地位并不稳固,1922年“壬戌学制”推行后,西方现代体育成为学校课程的主流,武术一度边缘化。尽管如此,民间与教育界将武术融入国家教育的努力并未止息。1926年,第十一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决议,重申应将武术列为学校体育正式课程,并呼吁系统培养专业师资^[49]。这一挫折恰恰揭示武术的国家化事业必须从“法令规范”升级为“组织承载”,方能突破纸面,落地生根。1927年,由谭延闿、李烈钧、张之江等要员发起国术馆^[50],以应时势之要求。与马良当年推行“中华新武术”主要依靠个人影响力与局部试验不同,中央国术馆的建立,适逢武术的民族意义已获广泛认同,社会习武之风日盛,专业化师资与团体组织已有相当积累。这既得益于“中华新武术”、精武体育会等诸多先行实践所培育的土壤,也意味着武术的国家化事业,至此具备从分散倡导迈向系统建构、从民间推动升级为国家主导的成熟条件。在内容上中央国术馆虽然也强调科学化和标准化,但其立意更高,更侧重于文化本位与政治整合。国术馆依托国民政府支持,构建起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广体系,并在“去门户化”与“保存传统”之间寻求平衡。其目标不仅在于促进个体锻炼,更在于通过构建统一的国术体系塑造国民精神、凝聚民族认同,并最终服务于国家政权建设。随后制定的各级国术馆组织大纲,即构建从中央到省(特别市)、县(市),直至区、村(里)的金字塔式垂直管理体系。这一自上而下、与国家行政体系同构的专职组织网络的建立,标志着武术的国家化进入了更高阶形态,即从“进入体制”发展为“自成体制”。该馆在成立之初便被赋予明确的政治使命,中央党部训词要求“使国术早日普及全国,养成全国民众国术化”^[51]。通过这一严密的行政网络,国家意

志得以畅通无阻地向基层社会渗透。至此,国术馆系统已完全超越一般民间体育组织的范畴,演变为履行着广泛国家职能的“行政机关”,并负责制定统一的武术教材与标准、推动武术成为学校必修科目、培育和认证标准化师资、并组织全国性的国术考试与竞赛活动^[52]。这种“行政力主导下的逐级‘分馆’网络构建管理模式”,使得武术的传承、推广与竞赛完全被纳入国家行政管理的轨道。

4 结语

“国术”的诞生,标志着一种身体技艺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政治重量。它既是对“不武”民族性的集体回应,也是对国民孱弱身体的系统性改造,个体的强身健体,被巧妙地编织进“强国保种”的民族主义叙事之中。科学主义的介入,表面上是对传统知识的祛魅与重构,其深层则是一场关于合法性的争夺。当武术必须通过科学的“翻译”才能证明自身价值时,揭示正是现代性话语权力的不对等。然而,这场“科学化”运动也并非全然的被动,它在某种程度上为武术争取到了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继续言说与传承的资本。国家权力通过教育体系与行政网络,完成对武术的最后收编。从精武体育会到中央国术馆,民间力量的自发实践,逐渐被整合进国家主导的体制化轨道。于是,武术不再只是江湖之远的技艺,更成为庙堂之上塑造“新民”、贯彻意志的“国家体制”。这段转型历程表明,传统命运从来不仅取决于其内在价值,更在于它与时代核心议程的对话能力。当一种身体技术能够同时回应民族存亡的焦虑、科学理性的要求与国家治理的需要时,它便获得被重新发明、并被赋予“国”之重担的历史契机。其中关于文化认同、知识权力与身体政治的复杂纠缠,至今仍是理解传统现代化之路的重要线索。

参考文献:

- [1] 唐豪. 中国武艺图籍考[M]. 上海: 现代印书馆, 1940: 9-10.
- [2] 陈稼轩. 从国术说到国粹[N]. 新闻报, 1929-7-3(12).
- [3] 徐一冰. 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J]. 体育杂志, 1914(2): 1-6.
- [4] 张之江. 国术与体育[M]. 出版地不详. 出版者不详, 1932: 1.
- [5] 严复. 原强[N]. 字林沪报, 1895-4-12(1).
- [6] 蒋观云. 中国武士道小序[J]. 广益丛报, 1905(73): 95-96.
- [7] 郭希汾. 中国体育史[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 1919: 1-2.
- [8] 张之江. 张之江先生言论集[M]. 南京: 大陆印刷馆, 1931: 1-2.
- [9] 许龙厚. 拳术教练法[J]. 体育丛刊, 1924(1): 114-121.
- [10] 陆师通, 陆同一. 北拳汇编[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0: 1.
- [11] 历史上有名之尚武国[N]. 国民报, 1901, 1(4): 18.
- [12] 饮冰室主人. 新民说[M]. 上海: 广智书局, 1908: 165.
- [13] 袁世凯. 颁定教育要旨[J]. 教育月报, 1915(10): 82-83.
- [14] 梁启超. 中国之武士道[M].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6: 21-30.
- [15] 中华武士会公启[N]. 大公报(天津), 1912-6-5(14).
- [16] 体育研究社提出全国教育联合会议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为学校必修科案[J]. 体育丛刊, 1924(11): 292-294.
- [17] 陈独秀. 青年体育问题[J]. 新青年, 1920, 7(2): 164.
- [18] 唐俟. 有无相同[J]. 新青年, 1919, 6(6): 633.
- [19] 费孝通. 化与文化自觉[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6: 402.
- [20] 蔡元培. 发刊词[J]. 北京大学月刊, 1919, 1(1): 1-3.
- [21] 罗志田. 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5.
- [22] 沈书珽. 提倡国技宣言[J]. 体育研究会, 1918(1): 1-2.
- [23] 吴志青, 谢强公. 应用科学之武术[J]. 武术, 1921, 1(2): 1-12.
- [24] 张之江. 本馆宣言[J]. 中央国术馆汇刊, 1928(1): 34-37.
- [25] 马良. 中华新武术初级拳脚科[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0: 1-3.
- [26] 马良. 中华新武术剑术科[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1: 451.
- [27] 陈铁生. 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国操纪事本末[J]. 精武, 1924, (42): 10-39.
- [28] 精武体育会史料选[J]. 档案与史学, 1998(1): 16-22.
- [29] 示禁拳匪[N]. 申报, 1900-4-4(2).
- [30] 马良. 中华北方武术体育五十年纪略[J]. 体育与卫生, 1924, 3(3): 32-40.
- [31] 王健吾. 华北之体育[J]. 体育季刊, 1935, 1(2): 48-60.
- [32] 湖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 湖北武术史[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4: 115.
- [33] 中华武士会公启[J]. 直隶教育界, 1913(3): 116-120.
- [34] 孙仲达. 四川近代传统体育[J]. 四川体育史料, 1983(2): 12-15.
- [35] 麦可乐. 最近之五十年 1872—1922[M]. 上海: 申报馆, 1923: 1-7.
- [36] 庞宜之. 吴稚晖先生演讲纪[J]. 精武, 1924(42): 64-65.
- [37] 梁仲璧. 读精武月刊书后[J]. 佛山精武月刊, 1926(5): 9-12.
- [38] 陈铁生. 精武本纪: 精武十周年纪念[M]. 上海: 精武体育会, 1919: 1-2.
- [39] 陈家骥. 总理提倡国术之遗教[J]. 中央国术旬刊, 1929(6): 1-2.
- [40] 蒋中正. 序[J]. 中央国术馆汇刊, 1928(1): 28-29.
- [41] 蒋总司令提倡国技[N]. 申报, 1928-02-01(13).
- [42] 王庚. 国粹体育之科学的研究[N]. 时事新报(上海), 1926-04-26(8).
- [43] 陈嘉谷, 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资料: 下[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2150.
- [44] 戴国斌. 中国武术文化生产[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126.
- [45] 邵爽秋. 历届教育会议议决案汇编甲编[M]. 上海: 教育编译馆, 1935: 12.
- [46] 军国民教育施行方法案[J]. 四川旬报, 1915, 1(9): 38-39.
- [47] 陈铁生. 精武本纪[M]. 上海: 精武体育会, 1919: 60-70.
- [48] 推广中华新武术案[J]. 教育杂志, 1918, 10(12): 11-12.
- [49] 学校体育应特别注重国技案[J]. 江苏教育公报, 1926, 9(5): 33-34.
- [50] 本馆筹备会纪事[J]. 中央国术馆汇刊, 1928(1): 30-31.
- [51] 于右任. 中央党部训词[J]. 中央国术馆汇刊, 1928(1): 35.
- [52] 中央国术馆史编辑委员会. 中央国术馆史[M]. 合肥: 黄山出版社, 1996: 39.

